



預算案兼顧「着眼當下」與「投資未來」



觀香港
黃楚基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以「創科驅動、金融賦能、多元發展、關愛惠民」為主題，既為香港未來高質量發展擘畫了清晰路徑，亦充分彰顯政府致力保障民生福祉、讓市民共享發展成果的擔當。未來，不論是鞏固既有成果，還是將宏圖落地，關鍵仍然在於堅持行政主導、強化執行。

這是一份「創新務實」的財政預算案，不僅穩住了庫房底線，更以躍馬揚鞭的積極姿態布局未來。當中有不少亮點，例如經營賬目終於出現盈餘、綜合賬目提早轉虧為盈、財政儲備穩步上升；同時將大規模投資基建、創科、金融及其他新興產業，惠民、解困措施亦持續加碼等等。

主動投資驅動發展動能

經營賬目能較預期提早轉為盈餘，充

分印證特區政府量入為出的政策科學有效，以及香港經濟韌性正在穩步恢復。而非經營賬目雖然仍錄得適度赤字，主要是因為政府正加大對基建、土地及長遠發展項目的投入，這是着眼未來、主動投資以驅動長遠發展動能的重要手段，與維持財政穩健的原則並不矛盾。

儘管政府近年發債額度提升，但資金主要用於北部都會區等基建項目，而非用於經常開支。雖然增加發債規模預計令GDP中債務佔比從14.4%上升至19.9%，但整體債務水平仍遠低於發達經濟體一般45%左右的債務負擔率。可見政府財政健康，規劃合理，長期可持續；財政策略既腳踏實地立足當期，也具備長遠的眼光投資未來。

全球現時變亂交織，百年變局加速演進，「行政主導」讓香港能在外部環境複雜的情況下，保持財政穩健同時大步向前，是香港實現良政善治的重要基石。這次預

算案能夠實現「着眼當下」與「投資未來」的關鍵平衡，正是行政主導高效落實的直接成果。

第一，行政主導強化了統籌力與決策力。行政主導是香港特區政治體制的核心，亦是基本法的明確制度安排。基本法賦予特區政府編制並提出財政預算、決算的法定權力，由特區政府主導確立財政政策及各類措施，從而主動謀劃、全面統籌財政政策和措施。就像本次預算案既壓縮開支、量入為出，強化財政可持續性，又加大對基建、創科、新興產業的中長期投入，實現「當期穩健」與「長遠增長」的平衡。

第二，在行政主導制度之下，政府得以靈活應變。在地緣政局不穩，貿易摩擦加劇，環球利率高企等複雜環境下，特區政府團結社會各界應對了重重挑戰；帶領社會各界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順應形勢變化，不斷鞏固提升自身優勢，持續推

動經濟高質量多元發展。

第三，行政主導制度促進行政立法良性互動，顯著提升治理與執行效能。特別是在「愛國者治港」原則全面落實之後，立法機關監督有力、配合有效，立法會支持政府不缺位、監督政府不越位的良性互動格局，高效審核並通過財政預算案，有關措施能盡快獲得撥款，從而令政策措施推進更順暢、落地更高效。

集中資源推動重大舉措

第四，在行政主導制度之下，特區政府能夠聚焦發展果斷決策、集中資源，推進重大措施。比如統籌推進北部都會區、新田科技城、河套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等重大戰略項目，及時開展大規模基建投資；還能夠推出100億元創科產業引導基金、AI+產業發展、國際會展引資等一系列拚經濟、謀發展的舉措，以及加碼「派糖」改善民生。

一份好的預算案，不能滿足於資源的簡單分配，更要為未來布局「蓄能」。香港發展進入新階段，無論出於自身發展需要，還是對接國家重大政策，都要求香港積極搶抓科技革命機遇，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各界看到，新一份預算案為實踐施政報告和落實政府施政方針提出務實舉措、提供財政支持，有利於發揮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內聯外通的獨特優勢，推動香港拚經濟、謀發展、惠民生，搶抓發展新機遇，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正加緊制定首個五年規劃，以配合國家「十五五」規劃。全面對接「十五五」規劃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舉措，未來更需進一步落實行政主導，以強勁的統籌執行力凝聚社會各界的力量，確保各項舉措落地見效，續寫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新篇章。

全國政協委員、思路研究會副會長

築牢國安防線 保障基本權利



法治眼
江樂士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是長期任務、須持續推進。2020年，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2024年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至今運作卓有成效，然而，國家安全威脅始終存在，敵對勢力已因應形勢作出調整，我們理應與時俱進、保持警惕，才能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2月10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一國兩制」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白皮書，強調「香港特別行政區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相較於2014年的白皮書側重闡明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2021年的白皮書強調「愛國者治港」，此次白皮書則重在應對新出現的國安隱患，特別是通過完善防禦機制來應對各類挑戰。

白皮書指出，雖然中央對維護國家安全負有根本責任，但香港特區亦肩負維護國家安全利益的憲制責任。憑藉2020年以來確立的法律制度，香港已實現了從「由亂到治」到「由治及興」的重大轉折。然而，外部敵對勢力依然存在，故白皮書明確指出需「進一步健全反制裁、反干預、反「長臂管轄」制度機制」。

國安形勢瞬息萬變，任何自滿情緒都可能導致嚴重後果。以史為鑒，1990年頒布的基本法，第23條訂明香港特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顛覆中央政府等傳統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在彼時看來或許足以維護國安。然而，鑒於2019至2020年的動亂教訓，2024年《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立法，通過本地立法以應對叛亂、破壞活動及利用科技危害國安的行為，此舉至關重要。

與此同時，世界多個司法管轄區紛紛意識到有必要不斷完善立法，確保國安機制與時俱進。2000年至2025年間，英國制定了多達15部反恐法，賦予警方更大的權力訊問和拘留疑犯，擴大了恐怖組織禁令名單。

有人聲稱國安法律造成「寒蟬效應」，白皮書對此作出回應，「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不追求『絕對安全』，或者『泛化安全』，對人權保障作出了完善的規定，保護香港居民根據基本法和有關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這意味着香港絕不會因噎廢食，反而更加積極保障人權。

以上論點切中肯綮，須予以闡明。香港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均強調，在法律實施過程中必須尊重人權，並須維護《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賦予的保障。儘管西方有輿論試圖將香港抹黑，但白皮書清楚闡明：「尊重和保障人權，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鮮明特色和重要經驗，必須長期堅持。」換言之，白皮書明確了在國家安全與公民權利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面對時而充滿敵意、始終挑戰重重的國際環境，香港在維護國安和保障權利方面，取得恰到好處的平衡。在「一國兩制」框架提供的背景下，香港既能維護國家安全，又不會以犧牲居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為代價。例如，黎智英在近期審結的國安案中，親身見證了普通法給予的充分保障。白皮書反映了這些現實，其致力於維護「一個既安全又自由、既安全又發展、既安全又開放、既安全又生機勃勃的香港」的承諾，定會令所有珍視香港生活方式的人們喜聞樂見。

註：原文刊登於《中國日報香港版》

律政司前刑事檢控專員



議事廳
姚柏良

香港正處於「由治及興」的關鍵階段，肩負着探索「一國兩制」新實踐、致力發展新動能、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歷史新使命。北部都會區作為香港未來發展的新引擎，實現「提速提效」，加快推進建設，是全社會的共同期盼。

特區政府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的過程中，展現出堅定的決心。特首不僅多次表達「心急如焚」的迫切感，更成立「北都發展委員會」，加快發展北都、引入產業和重大項目。新一份財政預算案進一步推出一系列具體政策。這一連串舉措，顯示政府正透過強化統籌與執行力，以更果斷的決策和更高效的行動，將宏偉藍圖轉化為成果。

要真正實現這一目標，筆者認為關鍵在於三方面協同並進。首先，需對外深化協同，構建「香港研發+大灣區轉化」的創新共同體。

充分發揮毗鄰深圳的區位優勢，大力發展口岸經濟，主動對接「深港口岸經濟帶」，並將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打造成規則銜接、要素流通的核心示範平台。在此基礎上，重點集聚國際科研機構與高端人才，聚焦生物醫藥、人工智能、低空經濟等新興產業，推動香港的前沿科研能力與金融資本，與大灣區完備的產業鏈和廣闊市場實現深度對接與融合。這不僅是區域合作，更是提升大灣區整體科技創新競爭力的戰略抉擇。

其次，對內培育生態，借鑒國際經驗打造「香港特色」創新生態。可借鑒外地的成功經驗：一是建立緊密產學研生態，吸引頂尖大學與研究機構落戶，並與龍頭企業共建研發共同體，鞏固知識創新源頭。二是培育活躍的風險投資網絡，透過針對性政策配套，吸引國際資本聚集，為創科企業提供資本支持。

第三，以人為本塑造環境，將「藍綠康樂旅遊生態圈」升級為吸引人才的戰略資產。所

有的競爭力最終落腳於「人」，建議政府將「藍綠康樂旅遊生態圈」提升至與產業發展同等重要的戰略高度，進行一體化規劃與推進。例如，在新田科技城等片區，可預先規劃連接濕地與科研區的「智慧生態景觀廊道」，融合低碳慢行、環境教育、科技體驗等功能。在符合保育原則的前提下，於外圍緩衝地帶適度發展高附加、低影響的生態研學與康樂項目。這種「片區創新」模式，能從根本上提升香港在全球人才爭奪戰中的獨特吸引力，並讓市民共享發展帶來的環境紅利與生活品質提升。

北部都會區是香港面向未來的戰略投資，其建設成效直接關係到香港能否在激烈的區域與全球競爭中贏得主動。「提速提效」不僅是口號，更要求全社會摒棄因循思維，以「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的擔當，在協同機制、創新生態、發展模式上敢於突破常規、大膽創新。唯有如此，北都才能成為驅動香港新飛躍的強勁引擎，不負時代所託。立法會議員

三策並舉 提速北都

破浪前行：香港引領企業出海新時代(下)



智庫說
葉良文
吳晉祺

踏入2026年，香港IPO市場熱度不減，正在排隊上市的企业超過488家。這股熱潮清晰承接了上篇所論述的趨勢：內地企業出海正從成本導向，轉向品牌與科技驅動的高增值階段，而香港的角色也需從傳統的「服務提供者」，向整合全球資源、定義市場規則的「生態主導者」升級。

為應對此一戰略升級，本文將內企以香港為支點的出海旅程，系統劃分為「與港聯絡」、「來港落地」、「在港發展」及「借港出海」四個階段，並着重探討每一階段中，香港如何通過改善服務痛點，打造香港成為內企出海首選第一站。

在初步接觸香港時，許多企業雖知悉其傳統優勢，卻對如何具體對接如出海的專業服務感到困惑。為此，打造一個綜合的諮詢窗口，其核心意義在於建立一個不依賴個人關係的標準化與透明化服務入口。這意味着將香港的專業服務優勢，轉化為一套清晰、穩定、可預期的公開對接流程。對企業而言，通過公開渠道即可獲得權威指引與確定性承諾，極大增強規劃的可靠性與落地信心。對香港而言，這是將自身營商環境的優越性從抽象概念，轉化為具

體可感服務的關鍵一步，能夠在最前端以專業、高效的統一形象吸引全球企業。

企業落戶後，首要挑戰必然是滿足營運與擴張的資金需求。許多具備潛力的初創及中小企業，與豐富的本地風險投資、私募基金等國際資本之間，存在着資訊不對稱與對接困難。

因此，由出海專班等機構主動牽線，對接企業與多元投資者，其深層意義在於搭建早期融資橋樑，從而拓闊香港金融生態的服務體系。此舉不僅是解決企業早期的融資難題，更是引導國際資本前瞻性地佈局國家創新前沿，同時推動香港的金融服務從主要服務成熟企業，延伸至培育早期高增長企業，為金融中心注入新的增長動能。

解決資金瓶頸後，企業在港深耕並邁向全球時，還將面對更深層次的標準對接挑戰。

當前，低空經濟、自動駕駛等新興科技領域，在全球範圍內尚未形成統一的技術和安全標準，加劇了企業出海的潛在風險。政府可從提供測試場景升級為參與，甚至引領國際規則的制定。一方面，這能使參與測試的企業在研發階段就與國際前沿標準接軌，提升企業的國際認可度，降低出海合規成本；另一方面，香港作為國家隊的重要一員，透過參與國際標準制定，還將提升國家在前沿創科領域的競爭優

勢與全球話語權。

當企業從香港邁向海外市場時，營商環境徹底改變：企業需要獨立應對陌生的法律、稅務與商業環境。香港專業服務具備國際水平，但要花時間挑選出兼具相關領域專長與當地服務網絡的機構，對於企業來說有一定難度。

為加強對香港專業服務的清晰導航，政府可在《香港專業服務助力中國內地企業出海成功案列實錄》的基礎上，制定出海專業服務機構名單，為出海企業提供一個市場化、國際化的「軟基建」。助力企業能夠快速鎖定適合的專業夥伴，大幅降低進入陌生市場的風險與不確定性，提升海外營運與供應鏈的韌性。打造以香港為樞紐的海外專業服務網絡，在吸引更多海外企業使用香港專業服務的同時，推動國內國際市場資源聯動。

此外，香港專業服務亦要不斷升級：持續深化對內地產業動向與企業實際需求的認識，並將出海服務網絡拓展至更多新興市場。唯有兼顧服務的深度與廣度，香港才能鞏固企業出海首選第一站的地位，助力內地企業破浪前行，更在此過程中釋放自身的經濟增長潛力。

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總監、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總監兼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員

美須放棄邊華心態才能實現「戰略穩定」

看大勢
宇文

2月25日，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在出訪加勒比海島國時對媒體坦言，中美關係目前處於「戰略穩定」狀態，中美兩國都意識到全面貿易戰對雙方和全世界都會造成「極深破壞」。

魯比奧曾是鐵桿反華議員，成為國務卿後開始「屁股決定腦袋」。可見其中美「戰略穩定」的論調，具有明顯的外交辭令色彩。當然，這番言論是在特朗普即將於3月底訪問北京前夕作出的，也是為了營造特朗普訪華前的良好氛圍。

理解中美「戰略穩定」的實質內涵，要從魯比奧身份轉變講起。議員時代的魯比奧，是貼着激進反華標籤的政客，這也是特朗普選其為國務卿的根本原因。諷刺的是，當白宮匯聚了一眾魯莽和大嘴巴的非典型政客時，反華極端派魯比奧卻成為白宮充滿建制派特色的重要幕僚。他必須

服務於白宮「美國優先」的議程，甚至要為特朗普的出格言論滅火辯護。

魯比奧深知美國對華博弈中並未佔據先機。一方面，美國的關稅大棒非但未能壓垮中國經濟，反而引發自身通脹加劇；另一方面，美國對盟友和其他貿易夥伴的關稅施壓、安保詭詐以及特朗普盟友領土的公然覬覦，讓美國成為孤家寡人。特別是美國最高法院對特朗普關稅政策的違憲裁決，使得特朗普成了美國和國際社會的笑話。

在此情勢下，去年中美兩國元首在韓國釜山達成的貿易休戰，成為特朗普引以為傲的政績。今年3月底的特朗普訪華，則成為特朗普向國內和全球展示外交實績的機會。一者，特朗普可利用中美G2關係反對派炫耀外交成果；二者，也有為中期選舉「沖喜」的意味。故而，魯比奧將中美關係提升到「戰略穩定」的高度，是外交

辭令的示好，也凸顯美國對華的深層焦慮。

這種焦慮首先體現在美國對華認知上的「不甘」，既不得不接受與中國「近乎勢均力敵」的長期共存現實，但又對華進行精心設計的「使絆子」。

首先，魯比奧在供應鏈問題上明確表示要「繼續提出重點關切」，尋求擺脫由中國主導的供應鏈風險。美國通過《關鍵礦產法案》推動稀土供應鏈「去中國化」，並施壓盟友建立「礦產夥伴關係」，試圖削弱中國在新能源、高端製造等領域的戰略優勢。然而，構建脫離中國的關鍵礦產供應鏈，短期內難以實現，這正是美國的焦慮和尷尬之處。

其次，在美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本月初到期的背景下，魯比奧直言雖中國公開表示不願談，但「我們會繼續施壓」。這種將中國拉入核裁軍框架的努力，本質上是以「全球穩定」之名，行約束中國戰

略能力之實。然而，美俄兩個「遙遙領先」的核大國在核裁軍方面表現得差強人意，中國不會被美國道德綁架。

更深層次看，魯比奧所謂中美「戰略穩定」的表述，是美國不得不接受與中國「近乎勢均力敵」的長期共存現實。但是，美國對華戰略實力的承認，也是美國焦慮的體現。簡言之，美國徹底放棄了通過「接觸戰略」改變中國的幻想，也意識到單純依靠壓制無法阻止中國的崛起。於是，美國不得已引入所謂「穩定框架」，即通過談判管控分歧，在對抗中尋求某種心照不宣的平衡秩序。

如果說，美國在關鍵礦產領域希望通過「友岸外包」「近岸製造」等和中國「脫鉤」構建美國主導的新秩序，魯比奧推動中國加入核談判，將是要將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規則體系之內。

因此，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美方口中

的「穩定」並非基於相互尊重，而是基於力量平衡後的暫時僵持。就在魯比奧宣稱「穩定」的同時，美國仍在推動供應鏈重組，仍在施壓談判，而中國則以削減關鍵礦產出口的方式，默默展示着自己的反制籌碼。這種表面平靜下的暗流湧動，恰恰揭示了所謂「戰略穩定」的脆弱本質。

中美兩強，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每一場博弈都引發國際社會的關注，更關乎全球經貿關係的走向。因此，中美建立「戰略穩定」關係，關乎雙邊關係健康發展和全球和平穩定。但是真正的「戰略穩定」，不應建立在遏制與反遏制的動態平衡之上，而應建立在平等與互信的基礎之上。

3月底的特朗普訪華之旅，是特朗普向政敵炫耀政績的外交秀，還是中美「戰略穩定」的新起點，值得關注。

國際關係學者